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4 月 20 日)

1、CSIS:气候领导力应包括外国援助

4 月 19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该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埃罗·亚博克（Erol Yayboke）和该项目研究实习生克里斯汀·李（Christine Li）的文章《气候领导力应包括对外援助》。文章认为，气候变化是拜登政策仅有的四个支柱之一，为了实现其目标和任务，美国需要广泛整合气候议题，并在对外援助和外交政策等各个层面上积极考虑气候影响。但是，这样做并非易事，政府的主要对外援助机构历来都缺乏整合跨领域气候问题的政治支持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专注于气候计划和政策的办公室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甚至被边缘化，与环境有关的对外援助预算逐年下降。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发展中世界造成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更强大、更以气候变化为重心的对外援助将至关重要。作者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需要政府层面把握全局；第二，同时进行“脱碳”（decarbonization）和“适应”（Adaptation）两种重要且相辅相成的方案；第三，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安全挑战，平衡气候与暴力冲突的关系；第四，增加外交参

与，重塑多边气候对话，重新评估多边机构作为分配资源和政治资本的工具，为多边气候合作提供强有力的国内支持。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limate-leadership-should-include-foreign-assistance>

撰稿人：李璇

2、《外交事务》：“四国机制”需加深合作应对挑战

4月15日，《外交事务》刊登华盛顿美国观察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杜鲁瓦·伊尚卡尔（Dhruva Jaishanckar）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坦维·马登（Tanvi Madan）的文章《“四国机制”如何实现其宣传目标》。文章提出，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印太地区乃至世界不断扩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是在印太地区重新构造均势的最佳方案。四方合作始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的救灾工作，但未能固化为持久的机制，直至近年来四国在领土、贸易、技术等方面均与北京产生矛盾该联盟才重新受到重视。目前四国已通过定期会晤、双边及三边、与第三方伙伴合作等方式就军事防御、基础设施融资、网络安全、新冠疫苗等议题展开了广泛合作。作者认为，未来几年是对四国重塑印太的关键考验，四国必须在能力范围内拓宽并加深彼此的伙伴关系。四国不仅需要在军事、网络安全、太空等领域合作，还应在贸易、金融、投资领域设置议程，团结“四国机制”以的国家应对中国。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5/how-quad-can-match-hype>

撰稿人：柳盈帆

3、《国家利益》：中俄已有结成军事同盟的迹象

4月20日，芬兰国防大学战争系特别研究员马蒂·普拉南（Matti Puranen）和芬兰国防军官员朱哈·库科拉（Juha Kukkola）在《国家利益》发表文章：《中俄关系已有结成军事同盟的迹象》。文章称两国日益紧密的关系和共同的外部威胁极大地提升了两国建立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展现出的暧昧态度也使外界众说纷纭。中俄两国在欧亚大陆有重要利益，可以通过在自身区域向美国施加压力，从而给对方在其区域赢得战略空间。例如，俄罗斯在东欧的军事行动将迫使美国将其军事资源和重心放在北约，这就减轻了中国在南海或台海的活动风险和阻碍，反之亦然。有学者指出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利益分歧阻碍了正式同盟的建立，但文章强调中俄两国不必被条约所束缚，因为现阶段的双边关系已经在两军的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12月底，中俄海军在日本海域共同巡逻；2021年2月，中俄和伊朗在印度洋举办联合海上军演。文章呼吁政策界和学界不要将焦点放在中俄是否会正式建立同盟，而应更加关注中俄在没有条约下的协调行动。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sino-russian-relations-already-bear-signs-military-alliance-183120>

撰稿人：马浩林

4、卡内基欧洲研究中心：缅甸政变后的合法性斗争

4月14日，卡内基欧洲研究中心网站刊登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宪法制定计划的负责人凯马娜·祖鲁埃塔·弗舍尔（Kimana Zulueta-Fülscher）撰写的文章《缅甸政变后的合法性斗争》。文章回顾了2021年初缅甸军方因不满2020年选举结果而采取的夺权行为引发大规模公民游行示威事件，并指出尽管2008年生效的缅甸现行宪法代表缅甸在多党制民主和法治上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众多问题。文章指出，自2012年以来欧盟一直致力推动缅甸的民主过渡，中止对缅制裁，开展多方面合作。2月底，欧盟外交理事会表示必须尊重缅甸2020年11月的选举结果，恢复合法政府，并表达了对公民社会、人权捍卫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愿与真诚解决缅甸局势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对话，也将对无端杀害平民的缅甸政变者实施针对性制裁。作者认为，缅甸需尽快撤销其违宪的紧急状态，尽快扭转政变局势，重振缅甸民主改革。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04/14/struggle-for-legitimacy-in-post-coup-myanmar-pub-84302>

撰稿人：黄瑛

5、《外交政策》：阿富汗需要的不是美军而是稳定

4月20日，《外交政策》在其官网发布由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访问助理教授迈克尔·哈什（Michael F. Harsch）和其研究助理泰勒·惠特尔（Taylor Whitsell）共同撰写的文章

《阿富汗不需要美军而需要稳定》。文章指出，美国在阿富汗可以实施“稳定岛屿”（islands of stability）战略，即以区域驱动的方式稳定脆弱国家，使美国在不需要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帮助扩大阿富汗当地的和平与繁荣局势。“稳定岛屿”战略是指在脆弱的、易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建设具有较高安全水平、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区域。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等国拥有的该类型区域在面对冲突时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文章表明，以区域为导向的战略核心在于权力下放，当公民拥有发言权，当领导人负起责任以维持安全和提供基本服务时，稳定的区域才更有可能繁荣。此外，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文章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应当专注于三个领域：一是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背景下，推动权力下放；二是实施长期援助项目，为地方领导人提供激励，使他们能够长期开展工作；三是抑制外国的颠覆行动，即对这些地区及其邻近地区采取谨慎一致的国际措施。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20/afghans-dont-need-u-s-troops-they-need-islands-of-stability/>

撰稿人：黄瑛

6、《纽约时报》：抛弃阿富汗是历史性错误

4月19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发表评论文章《抛弃阿富汗是历史性错误》。文章回顾了美国在阿富汗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包括性别平等、

文化建设等，并同时指出由于美军将重心放在阿富汗军队的装备支持和人员训练上，因此美国在阿富汗付出的代价并算不高昂：自2015以来，只有不到20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敌对行动中丧生。作者警告从阿富汗撤军将严重损害美国承诺的影响力。威慑政策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力量，战略可信度同样重要，因此从阿富汗撤军对乌克兰等迫切需要美国保护的盟友和国家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长远来看，美国信誉被损害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文章同时指出目前有约1.7万曾受雇于美国政府或军队的阿富汗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如果拜登政府不及时签发签证，这些人极有可能遭到清算。

<https://www.nytimes.com/2021/04/19/opinion/afghanistan-biden-troops.html>

撰稿人：马浩林

7、兰德公司：中国不必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敌人

4月19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该公司国防分析师阿什莉·罗德（Ashley L. Rhoades）与中东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达莉娅·达萨·凯（Dalia Dassa Kaye）的文章《中国不必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敌人》。文章认为，中伊协议为两国经济方面的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无论规模大小如何，中国对伊朗的大量投资并不意味着“中国-伊朗轴心”的建立。美国过度关切中伊关系进展，尽管中国威胁着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利益，但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在中东的对手。中国和伊朗没有足够的共同利益来支持持久的伙伴关系，

伊朗只是中国在中东更大利益中的一部分，而中伊合作的局限性给华盛顿带来了机遇。美国与其将精力和稀缺资源花费在不可行的目标上，例如试图将中国“赶出”该地区，不如尝试减轻中国介入的负面影响并重新平衡自身的投资。中国在中东的行动并不总是损害美国利益，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并不一定会侵蚀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有时美国甚至可能会发现与中国有重叠的利益，如推进中东核不扩散目标、人道主义救灾与援助行动和反海盗巡逻等等。在面对全球众多挑战的同时，美国应该在竞争中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潜在机会。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4/china-does-not-have-to-be-america-enemy-in-the-middle.html>

撰稿人：李璇

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应在巴以问题上转变政策

4月19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其访问学者扎哈·哈桑（Zaha Hassan）、中东项目主任丹尼尔·李维（Daniel Levy）、中东项目研究分析师哈拉马尔·基尔（Hallaamal Keir）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马万·穆沙（Marwan Muasher）的文章《打破巴以问题的现状》。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应该抛弃特朗普的“和平促繁荣”计划，放弃重启和平进程，转而制定以权利为核心的战略方针。作者提出，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转向应该重点考虑四方面的内容：优先考虑权利和保护人民；逆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申国际法；明确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期望；支持新的多边方法和问责制。为了达成

目标，美国可以采取以下行动：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支持居住在以色列控制领土内的人享有平等权利；重启美国和巴勒斯坦的双边政治接触，将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与驻以色列大使馆分开；向联合国提供资金以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哈马斯承诺不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前提下促进哈马斯与法塔赫和解；结束对加沙的封锁；重申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建立监督问责机制确保美国的援助不被用于侵犯人权；维护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决议；避免加剧中东地区军备竞赛。美国的参与应该更好地推动公正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安全。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4/19/breaking-israel-palestine-status-quo-pub-84167>

撰稿人：柳盈帆

9、布鲁盖尔：欧中投资协定的意义不应被低估

4月13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由高级研究员安德烈·萨皮尔（Andre Sapir）等人撰写的报告《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是否被低估》。报告认为，《欧中全面投资协定》具有重大意义，能够约束中国根据国际条约放开外国投资限制，并在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和透明度等问题上做出改进。作者强调，欧中之间的投资开放程度长期不平衡，尤其是在服务行业，而《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有观点认为，欧盟出于有限的经济利益考虑而承担地缘政治上的风险，特别是为此与主要政治盟友美国分道扬镳，

所以签署这一协定得不偿失。该报告则认为，该协定提供的经济利益相当可观，虽然表面上协定只要求中国稍稍扩大市场准入，但这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已经大幅度单方面放宽外国投资的限制，欧中双方只是借此将这些举措固定为国际条约。最重要的是，该协定包括了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和透明度方面的新规则，有利于改善在华欧盟公司的市场准入，这些双边新规则也可以为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的改革铺平道路，其目的是更好地将中国融入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而这正是欧盟、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共同目标。然而，在中国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的情况下，该协议可能不会被欧洲议会批准。

<https://www.bruegel.org/2021/04/is-the-european-unions-investment-agreement-with-china-underrated/>

撰稿人：张诚杨

10、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盟应与“四国机制”加强协调

4月16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亚洲项目协调员曼尼莎·路透（Manisha Reuter）的评论文章《真正的朋友：欧盟和“四国机制”如何促进印太地区的安全》。文章认为，在美日澳印四国以“四国机制”联手应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纷纷出台本国的印太战略之际，欧盟应当将“四国机制”纳入自身的印太战略框架之中。尽管“四国机制”是非正式的安全对话，而且美日澳印在这一框架下的合作大多局限于供应链、技术和公共卫生领域，但是中国仍然对此

持反对立场，因此欧盟长期以来对与该机制的合作保持谨慎态度，以免破坏欧中关系。然而，考虑到近来中国对欧盟施加的制裁，以及欧盟本身对于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迫切需要，欧盟应当抓住“四国机制”扩大化的契机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接触。相关合作可以涵盖三个方面：第一，海洋安全，特别是扩大欧盟各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第二，公共卫生，通过提供疫苗以平衡中俄的疫苗外交；第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与美国和印度合作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融资。

<https://ecfr.eu/article/friends-in-deed-how-the-eu-and-the-quad-can-work-together-to-promote-security-in-the-indo-pacific/>

撰稿人：张诚杨

撰稿人：黄瑛、马浩林、柳盈帆、李璇、张诚杨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